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痛定思痛】	文革中的施害者更需反思和悔恨	文贯中
【往事非烟】	告别盲从——走向精神自由	孙月才
【动乱岁月】	抄家轶事	韩丽明
【亲历者言】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五）	阎长贵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痛定思痛】

文革中的施害者更需反思和悔恨

• 文贯中 •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2016年）4月23号在徐汇中学66届高三同学毕业50周年聚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曾宪一校长（或校长代表），尊敬的各位老师，久别的各位老同学：

谢谢徐汇中学的领导对这次聚会的鼎力相助，谢谢参加这次聚会筹备工作的同学，他们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我们得以在这里济济一堂，再次相聚。

有机会做简短发言，内心十分感慨。毕业之后，很多同学在各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如果请他们做发言，会比我的发言精彩得多。我想谢谢他们，将发言的机会给了我。吴祥华告诉我，聚会后将出版纪念文集，收录各位同学的回忆。我对此充满期待，希望早日分享到各位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今天，我们这群两鬓如霜，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重新回到具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一度满目苍夷，斯文扫地的校园，目睹母校变得如此美丽，整洁，肃穆，一片欣欣向荣，衷心为母校高兴，更为今天的学生获得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而万分羡慕。这一切来之不易。

遥想50年前的今天，校园里也曾充满我们无忧无虑的歌声，四处奔跑的矫健身影，欢快明朗的笑声。我们曾经勤奋学习，努力理解人生的真谛；我们曾经热血方刚，希望不辜负人民和社会的重托；我们也悄悄编织个人的理想，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我们追求美好，向往纯洁，期盼光明。

我们没人料到，腥风血雨正在逼近，一场浩劫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美好的理想即将化为一缕青烟，我们最珍贵的青春将伴随困惑，磨难，乃至血泪度过。以最崇高的名义发动的文革，使祖国陷于空前的苦难。整整十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到普通民众，几乎无人幸免。

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内乱，文革初期提出的虚无缥缈的崇高目标，没有一项得到实现。不但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而且人们内心最卑鄙，最肮脏的情感被召唤出来，使夫妻反目成仇，使子女背叛父母，使同事相互告密，使师道尊严遭到践踏，使同学间的友情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甚至使无数生命遭到毁灭。

我注意到经过筹委会的不懈努力，原来66届高三全体同学中，有一半左右前来出席今天的聚会。但是，除了一些人已经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一些人远在海外，毕竟有不少同学虽然健在，而且生活在上海，却选择了缺席。

例如，当年扮演江姐和孙明霞，以多才多艺而扬名全校的两位美女，以及扮演甫志高的俊男，就没有来出席这次活动。对他们来说，徐汇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对此，我十分理解。

我有机会读到王清华老师就本次聚会所写的一封信，主张这次聚会不能回避对文革的反思。我觉得这个意见十分正确。我们中不少人对当年同学间的纯洁友情十分留恋，希望能将这种友情重新召唤回来。但是，曾经存在过的友情已被文革的魔爪破坏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甚至化为齑粉。俗话说，破镜难圆。

要使五十年前的同学友情，在经过文革的摧残之后，在古稀之年得到恢复，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尽管我们说，文革使一切都成了受害者，但文革中，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有自己的选择的。一些人变成施害者，成为这场浩劫的帮凶，一些人成了受害者，成为这场浩劫所吞噬的对象，但更多的人却选择成为旁观者。

由于当年的施害者处于一种予取予夺，居高临下，主宰别人命运的地位，其实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权。我认为，施害者之所以成为施害者，固然可以怪罪于当年大肆宣扬的“忠实工具论”，但不能否认，他们其实是可以选择当旁观者的角色的。可是，他们却选择了放弃做人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人格的底线。

施害者和受害者在文革中的经历绝对是不等价的。如果施害者没有任何的反思，悔恨，如何能希望当年的受害者忘记各种屈辱和伤害，和施害者笑脸相迎，握手言欢呢？所以，如何才能找回当年的同学友情，值得大家反思。

我想借今天的机会，感谢当年帮助过我的人。由于我的处境，他们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能做出帮助我的选择。这样的人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选其中几个，公开表达我的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当年负责牛棚的张师傅。惭愧的是我都不知道他的全名。2000年校庆时，我曾到处找他，但被告知已经退休回老家。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山东汉子，他本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在我生命面临最大威胁的时候，袖手旁观，甚至可以选择成为施害者，扮演一个对反动学生毫不留情的“英雄”角色。可是，他选择的是挺身而出，尽力挽救我的生命。

1968年初秋的一天，我被西校舍二楼用力扔下的铁脚椅子砸得昏死过去。是他用自己的手绢清理了我满脸的鲜血，在我清醒过来后，他又一步步扶我到工宣队办公室，坚持要他们负责我的生命安全。由于他的据理力争，我被及时转移到一家工厂，逃过了学校里那些暴徒的暗算。

不管当时的文革每天如何鼓动人们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毫不手软，他本着做人的良心，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谬论，始终将我看作是一个无辜的，只是出生在“错误”的家庭，一时倒霉的年轻人而已。如果没有他这种对所有的生命，无论出身，无论贵贱，一律尊重的做人底线，我真不知道今天是否还能和你们欢聚一堂。

我想感谢的第二个人，是同为牛棚难友的王烈伟老师。当时我关在牛棚里已将近一年，工宣队知道我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又不能随便放我出去。他们先要我承认自己是反动学生，我拒绝承认；于是降低我的罪名，要我承认参加文革动机不纯，我又拒绝承认；最后再次降级，要我承认有自由主义倾向，没有积极响应复课闹革命，我再度拒绝。

王烈伟老师十分注意我和工宣队的每次对话。虽然隔着一段距离，却一直尖着耳朵听我和工宣队的争辩。最后一次，工宣队一走，他便说我过于固执。工宣队其实在帮我找台阶下，我却死不认账。经他分析，我才恍然大悟，赶紧按工宣队的自由主义口径写了检讨，很快被从牛棚里放了出来。

今天，王烈伟老师远在美国，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对他的深深感谢。我从小受不到父母的庇护，王烈伟老师犹如仁慈的父辈，在关键时刻，虽然自己还未获得自由，出于对我的关爱，选择了冒险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早获自由。

我想感谢的第三个人，是我的同班同学邹檐。遗憾的是，他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他去世前不久，我和一些同学去医院看他，他竟然很诚恳地向我道歉。理由是，他硬将我拉进他所参与的自觉红战斗队，害得我后来蒙受各种苦难。其实，我更有理由感谢他。

我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匆匆送到遥远的东北插队，家里只剩下年过八十的婆婆。大家知道，我们兄弟几个从小由这位老人抚养长大，最后一个个都离她而去，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和边疆。她曾经说过：“我的命已经这么苦，不明白为什么我带大的小孩一个个比我的命还要苦。”一个人要有如何深沉的爱，才会说出如此痛心疾首的话来。

我万分感动的是，邹檐虽然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却细心地体会到我被迫远离风烛残年中的婆婆，内心一定有难以形容的苦楚和悔恨。他不止一次，在节日到来的时候，悄悄带着食品去看望孤苦伶仃的婆婆，和她一起度过一个夜晚或一个中午。

邹檐还会编出美丽的谎话，说我将来一定会有前途，以此安慰婆婆。当时文革仍在肆虐，前途渺茫。邹檐完全可以作出另外的选择，因为谁都不会相信，远在东北乡下的我，还会有什么美好的将来。但邹檐基于做人的底线，选择了替我尽孝。他的善行帮助了婆婆顽强地生活下去。

我想感谢的第四个人，也许大家会大吃一惊，因为我想谢谢后来成为我的“冤家对头”的唐雪麒同学。我被公认是徐汇中学出身最坏的学生，可是，早在1966年9月，我便到全国大串联。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开上海。

串联回来后，从邹愴等同学的口中了解到，班上出身不好的同学在10月1号被剥夺政治权利，不准参加游行，关在学校里又是饿饭，又是打扫校园，并被迫写批判反动家庭的检查。后来一些同学更受到各种人身迫害，甚至毁灭性抄家。

听了他们的哭诉，我极为震撼，同时也感到唐雪麒其实帮了我一个大忙，使我无形中逃过了文革初期发生在徐汇校园里的红色恐怖。开介绍信到全国串联一事，完全是唐雪麒的主动，一开始我还有些犹豫。

当时反动血统论正向全国蔓延，狗崽子，黑五类这种法西斯语言充斥大街小巷。北京来的红卫兵挥舞着皮带，不可一世。我觉得只有红卫兵才有资格全国串联，自己的这种出身，万一让人知道，不但会倒霉，也会连累唐雪麒。

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情境下，他的建议绝对是一番好意。今天我想当着大家的面，想他致谢。对我来说，他当时坚持了做人的底线，并没有因为出身的不同，或者观点的不同，就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迫害我。尽管后来我们成了两派，但任何人在困难的条件下做了正确的选择，使我至少逃过早期的红色恐怖，我是不应轻忘的。

我还要感谢我的婆婆，感谢她的养育之恩，感谢她在我生命的最低谷的时候，仍然对我抱有坚定不移的爱和信任。大家知道，我母亲离开世界的前夜，曾留下遗言，婆婆可以带走我家所有的细软，回老家养老，而我们兄弟几个应该被送进孤儿院。当时婆婆已进入古稀之年，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抚养我们几个兄弟的重任。

令我惭愧的是，我们弟兄几个，包括我自己，却一再使她失望，使她担惊受怕。1968年初，我曾被人绑架到学校，关在老校舍，失去自由长达半个月。由于得不到任何音讯，她内心产生巨大的恐惧，只能每天坐在弄堂口，以泪洗脸，盼我回来。我家几次被骚扰，破坏，她只能默默忍受。红卫战报登出文章，宣布我为反动学生，引起邻居们的风言风语，她听了心如刀割，只能躲在家中，对天长叹。

文革中我经常被人殴打，被自行车冲撞，被人抢夺书包。虽然我时时生活在恐怖之中，但我瞒着婆婆，自认为很坚强地应对下来了。

仿佛这一切对婆婆的打击还不够，19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学校的西校舍被人蒙着眼睛，遭受毒打，遍体鳞伤。这一次，当我竭尽全力，挣扎着爬回家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信心完全崩溃。婆婆看到我浑身血肉模糊，也几乎晕死过去。看到她浑身发抖的模样，我感到深深的悔疚。

我对她老人家说，真的很对不起她，我一直想作一个人人夸奖的好人，但不知为什么，总是成为大家都要嫌弃和躲避的坏人。我又说，我是不是应该早些去死，免得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和耻辱。

她老人家一边为我清理伤口，一边说，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坏人，在她眼里，我仍然是一个好人，她要和我过一辈子，要我一定活下去，千万不要步我母亲的后尘。

当时我身边除了她老人家，已没有任何亲人。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孤独，无助，感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感到自己的命运是如此的任人摆布，不由自主。婆婆在我的眼里是个圣人。如果她当时表示出对我的一丝埋怨，或一丝指责，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勇气活下来。感谢

她的宽容，她的仁慈，和她内心透出的坚毅。她的话极大地宽慰了我的心，使本来已经十分绝望的我感到不能弃她而去。

今天，我这样一个被徐汇中学从高中各班到初中各班轮流批斗的反动学生，成为同学们的代表作全体大会的发言，我内心的心路历程只有婆婆知道。愿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为此感到一丝安慰。

我将自己的《吾民无地》一书献给了她老人家。我在书中写道：“谨以此书奉献给养育我长大的外婆应瑞林。她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和面对弱者自然流露出的深切同情，像一座由仁慈和智慧垒成的丰碑，永远屹立于我的心中。”

很多同学在我处于逆境之中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一些人希望我不要在发言中提到他们，这里我只能隐下他们的名字。虽然文革极力破坏做人的底线，践踏做人的良知，想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冷酷无情，翻脸不认六亲的斗争机器，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在关键时刻，我总能遇到坚持做人有底线的好人。

由此想到，我们固然无法控制外部的大环境，但是，如果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能够坚守做人的底线的话，我们就能提醒自己，以及教育我们的子女，绝不作虎作伥，绝不落井下石，绝不指鹿为马，或者恩将仇报。

希望中国永享安定，繁荣，和平。但若有不测事件再度发生，黑暗势力再度卷土重来，也许我们没有像陆丙甫以及他的战友们当年的勇气，直接质疑黑暗势力的合法性，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牢记文革的教训，坚守做人的底线，只要我们默默地不配合黑暗势力的淫威，良知之光就能更快地战胜黑暗和反动。

最后，希望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健康，快乐，幸福！希望我们抓紧时间向别人表示感谢，或表示歉意，为同学之情的恢复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在这种坚实的基础上，迎接未来更多的聚会。

□ 来源：《共识网》

~~~~~

## 【往事非烟】

告别盲从——走向精神自由  
——《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记》自序

• 孙月才 •

从青少年时代起即开始写日记，这就是这本日记的来历。当然这是一本写于六十年代的日记，显然和你所想像的日记会有所差别。

文革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性事件，也是世界现代史上十分罕见的重大事件。怎样让这样一个事件不止停留在民族的痛这个层面上而上升到思想的层次，非常值得我们思考。这本日记是对当时事件的一个见证，它有事件的现场，有历史的细节，更有相关人物的思想和心态。这些人物不仅有红卫兵，还有工人、农民、军人、专家学者，以至于中央首长和“中央文革”要员。许多事情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甚至很可笑，但也有人间

真情、不灭的信念，那都是历史的真实，不容回避，也不容篡改。相信这样的一份历史真实对于文革的研究会有所裨益。

说到文革，自然会想起北大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文革虽不因北大问题而起，但这张大字报确实成了文革的燎原之火。大字报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的产物。《五一六通知》的基本精神是所谓的彻底批判和清洗党、政、军和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实在这个《通知》之前，北大已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先就是从哲学系开始的，当时就是否将陆平校长的错误上纲为“路线斗争”的问题上，形成了两派不同意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强调要注意政策，意在保护陆平，接着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整了反陆平一派的党员。正当拥陆一派得势之际，党内传达《五一六通知》，公开点名批判彭真。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抓住这一形势，领衔贴出了大字报。至6月1日毛泽东批示把这张大字报公开发表，局面逆转，大批拥陆派倒向反陆立场。全国文化教育界的群众也蜂起反对各自领导。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到了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由校园“杀向社会”。不过这时还大致限于学生的红卫兵运动，没有波及工厂企业。

把工人推向文革灾难的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为迫使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制造了以赴京上告为由，卧轨拦车的“安亭事件”。在张春桥的支援下，终于达到目的。“工总司”以夺权为目标，在1967年1月发动“一月革命”，以万人大会批斗上海主要领导人的方式，夺取了上海市各要害部门的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经毛泽东建议改称为“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肯定了这次夺权，并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经验。

聂元梓等人去上海串联曾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目的是发动群众把文革之火烧得更旺。但是上海很多群众并不欢迎聂元梓，理由是革命靠自己，不需要外来保姆。但聂毕竟有毛泽东的支持，终于突破阻碍，对上海文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文化教育界搞得天翻地覆，那么上海“工总司”的出现开创了全国夺权的先例。文革由此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跨越各个领域的大动乱、大浩劫。

从北大到上海，再到北大，最后又回上海，这是我的文革路线图。在这条路上我担任过“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也担任过驻上海的“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负责人。当时北大和上海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曾亲身经历。在北大和上海也各被审查过一次。北大的审查最终为8341支左部队所澄清，以赔礼道歉作结；上海的审查因为是王洪文及其上海同伙亲自下令进行的，一直到文革后才以“政治迫害”作结。两次审查都剥夺了人身自由，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当然那也只是文革中无数违法乱纪的个案之一。

文革结束了，中共中央做了决议，彻底否定文革。但鉴于文革自身的复杂性，对于历史影响的深刻性，以及由此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一个决议是不可能解决这诸多问题的。应该说，对文革的研究还远未全面展开。有必要对文革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刻反思，结合当时自己的心历路程去思考、分析和反省，自有其特殊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大家或以受迫害者的身份控诉，或以当事人的角度辩解，或以回顾的方式猎奇，而一个时代的深层悲剧却逐渐隐没了。

我怎么会卷入文革的漩涡？我当时追求的是什么呢？这是再次面对已成历史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拷问自己的。

1964年我考入北大研究生后不久，在邻近海淀的马路上偶遇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老同学。我当年团支部书记笑着对我说：“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啊。”对于一个爱钻图书馆，但政治上又有上进心的人去研究古希腊哲学，她觉得很有必要这么提醒一下。三十年后的

1994年我趁北大哲学系八十周年系庆时拜访了她，问她可还记得那句“战士”和“院士”的话？她笑着说：忘了！但我没忘。应该说那句话正切中了我当时的矛盾心理。经过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已有了成为“战士”的心理基础。六十年代初期哲学社会科学界被称为反修防修的一条战线。当时所营造出的战斗气氛，以及朝气蓬勃的现实生活，几乎压倒了我原本对古希腊哲学的浓厚兴趣。我甚至为此改变了专业，由古希腊哲学改为实用主义批判。这遭到了系主任郑昕先生的批评，但还是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这种在“战士”与“院士”之间挣扎与交战中的生活，一遇文革的风浪，成为“战士”的渴望就会击退内心真正的学术爱好。

这个转折点就是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直接攻击的对象是陆平校长。我谈不上是反陆派，平时在校园里遇见他也总是很尊敬地叫他一声陆校长。但5月25日大字报贴出当晚，哲学系控诉“三家村”的大会遭到拥陆同学的干扰，接着在三角地大字报前辩论时更遭肢体攻击，这使我十分反感。当大字报公开发表时，我已彻底地站在了反陆的一方。反抗压制时，一种“战士”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文革人为地制造了这样一种环境，于是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所培育的种子便生根发芽了，开始绽放了。

支持大字报是一个纯粹偶然的契机，而对当一名“战士”的渴望，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决定了我一定会卷入文革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在人治高于法治的社会中，整整一代人被培养起对毛泽东的绝对信任。我当然会“自觉”地要求自己在文革的实践中彻底告别学术梦想，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当我在外文楼与冯友兰、宗白华、洪谦先生等一起受审查时，我内心是不把他们当一回事的。坐在我左边的是宗白华先生，我常常提醒自己：绝不要走宗白华的道路，宁可去抡铁锤，推煤车。在那时，那种强烈地表达“忠心”的情感虽然被时代所扭曲但却是真实的。

北大是具有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但“五四”同时也培育了现代中国的一种激进精神。尽管相对于全国来说北大是一个富于独立思考的地方，但这张大字报却不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北大的师生并不了解中央内部斗争的详情，凭什么这么“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张大字报呢？一张没有事实根据的大字报怎么就相信它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呢？究其原因，盖出于盲从，一种掺合着激进精神的盲从。1949年之后，自由精神的淡漠，传统风骨的遗弃，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北大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冲淡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薄弱了，但一种激进的精神却在不断得到滋养。这就决定了由领袖个人的意志就可以发动一场“群众运动”，但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战士”跃马挺枪刺中的原来是一架风车，那个时代孕育了无数堂吉诃德式的悲剧。

中国的近代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传统的专制主义使人们对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法治认识极为肤浅。精神的自主，人格的尊严更在革命的名义下被消蚀。1949年以后的学校强化阶级教育，批判人文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是极易受到煽动的。一有什么运动便盲目跟从，甚至疯狂。历史的吊诡在于人权惨遭践踏的文革催生了现代中国对于人文主义的真正思考。原先的“真理”经历了“苦难的历程”后，显示了其荒谬的一面，人的精神通过这个否定的环节得到了提升。一个无法抹杀的事实是，曾经的红卫兵一旦从文革中觉醒过来便从盲从的一代一跃而成为极富独立思考的一代。“四五”的一代、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一代都是如此。在这种独立思考中“怀疑一切”与“坚持理想”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命题。不可否认，“文革”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人们曾经热衷于当

时还无法识破其错误和荒谬的理论观点。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对理想的激情，身处牛棚而仍仰望灿烂星空，在当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在时代的错误中显现的“真诚”让人有悲怆之感。如果“真诚”和“理想”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彻底耗尽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将是真正的悲剧。这种“真诚”和“理想”让曾经的红卫兵对过往的错误有了反思，灾难也才有可能转化为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再次成为主力。但另一方面，理想的破灭所带来的“怀疑一切”的倾向，依然侵蚀着这个社会。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中重建“真诚”和“理想”已经成了这个时代最为重大的使命。

上海审查结束后，不少人说我“有独立思考精神”，真是大错特错了。从1966年“文革”开始时高喊“打倒刘少奇”，到当时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何独立思考可言！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通过实践检验的决策、理论，是可能有错误的。但在一个政治不透明、民主不健全的社会，在一个风行“个人崇拜”的时代，对一个从小教育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青年来说，面对“最高指示”，面对毛主席审批的、中共中央的决定，你如何“独立思考”？如果你思考得“出格”一点，轻者检查，重者被抓，以至于牺牲生命。“反右”时的林昭（1932—1968，北京大学学生），“文革”中的张志新（1930—1975，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她们都是在独立思考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物，是“精神界之战士”（鲁迅语），是我们国家的优秀儿女，但都是通过权力机构被“合法”地枪杀了。面对遗烈，我只能低头深省。“文革”的历史证明，领袖的言论、中共中央的决策，有可能是背离民心的，有可能是背离历史走向的，有可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否深切认识到这一点，是公民是否有“独立思考”的第一步。文革后我主要以学术方式将文革中的困惑转化为理论问题来加以反思。这种反思荆棘载途，崎岖艰难，但这也是对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的一次淬炼。

王若水（1）在《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有一个题为“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应”的附录。其中说到，“提出人道主义是对文革进行痛苦反思的结果，是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反弹。指出异化，是为了克服它：克服政治的异化，要靠民主；克服经济的异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异化，要靠思想解放。”这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论战一方的理论旨意，它也道出了我的心声。王若水针对拙作《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和百家争鸣——重读胡乔木（2）〈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一文说，“文章的观点和我们是一致的。”是的，我当时是属于周扬（3）、王若水一派的。

应该从各个角度来对文革进行反思。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角度对文革进行反思是否可行，本来可以通过平等的对话来进行探讨，胡乔木却以身居政治高层的身份把不同声音压制下去。周扬为此作了违心的检查，那颗曾经坚强的大脑被压垮了，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王若水此后几乎在国外访学中度过余生，在国内毫无用武之地。胡乔木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似乎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新真理，不容商榷与批评。但是我坚信真理的探讨无关身份与地位，在大论战沉寂了四年以后我重新发出了与胡乔木不同的声音，发泄了多年来淤积在心的不平之气。我充分利用了“内刊”（《上海理论》）的便利，在论述中就宪法保证言论自由这一点痛快淋漓地进行申说（中共中央党校《党校论坛》1989年第一期和《新华文摘》居然将拙作全文刊载，实出乎意料之外）。从宪法高度来看言论自由是我最在意的地方，意在争取人的平等言说的权利。龚育之（4）写于1997年的《几番风雨忆周扬》中写到了胡乔木读了我的文章之后的感想，说“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胡乔木的“同意”当然不会是我的理论观点，所以王若水说：“胡乔木说他同意孙月才的观点……我想他只是指第三点（即“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引者按）并不同意整篇文章。”胡乔木的思想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角度去反思文革。他能接受“过分政治化”的批评已经难能可



贵，诚如郝怀明所说，“不妨把胡乔木的这一认识，看作是他对那场争论的一个反思”。但这已经不能给周扬一个真正的安慰了。2006年龚育之在为郝怀明著《如火如荼话周扬》一书所作的序中重提胡乔木1997年对拙文的读后感，但又加上了沉重的一句：“胡乔木的意见已经无法转告周扬，因为周扬此时已经一病不起，渐成植物人。”多么令人惋惜啊，曾经的巨大精神压力，在时代的进步中已烟消云散，但一个真实生命却因漠视宪法而从此长眠。

尽管在这场论战中我自诩周扬一派，但文革中我也曾对他大加批判。当时我应《文汇报》之约写了一篇“大批判”长文，“批判”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是周扬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议上的报告（文章曾经毛泽东多处修改）。批判可谓无理之极，想来深为内疚。其实当年周扬发表这个报告时，我读过好几遍甚为喜欢，尤其玩味那个富于哲学思辨的“异化”概念。周扬在报告中已在鼓励我们做思想战线上的“战士”，但文革使我心目中的“战士”比周扬所要求的“战士”更为“战士”。这是周扬始料不及的，于是那本我喜欢的小册子就成了大批判的牺牲品。故我写那篇重读胡乔木文章的论文时，却有一些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周扬道歉的用意。

我早在1981年即以《人道与异化的对立——对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考察》一文为开端反思文革问题。但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我的有关文章也遭人指责，受到不小的精神压力，由于明智领导者的保护，才逃过一劫。1985年我还写了论自由的文章，这也许是国内最早关于自由的专论。但论自由的命运却并不很自由，我关于西方哲学中自由与文化论题的专著差点因反自由化而流产。后经出版社建议弃用《自由与文化》这一书名才得以出版。这本书的论旨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恩格斯语）。它包含着对文革的批判。

陈寅恪有云：研究学术，发扬真理，要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这是一切思考最基本的要求。但真要成为现实却又有着万般的艰难。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独立的精神，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思想，一个人就没有了灵魂，一个民族就会沉沦；没有这样的坚持和担当，即使是反对文革的人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轻易地把文革的幽灵重新召唤回来，这是人们最要警惕的。

日记出版前，原件的影本经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审核后请专家鉴评。然后在香港电脑植字，由我校对作注。在此过程中我做了些技术处理，补了个别脱漏的字，加上星期，删去了一些口号，改动了个别人物的姓名。但对北大老师同学仍保持真实姓名，这里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为保持真实，我还尽可能将他们的后续发展在注里作了交待，我以为这是有价值的。此外，日记的附录中收录了一些有关我离开北大后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书信，以补日记之阙。日记跨越十年，篇幅不小，不可能全部刊出。文革来势凶猛，开头两三年即是高潮，这部分日记就最为详尽。高潮过后，红卫兵运动随即瓦解，轮番挨整。这一部分日记则有所取舍，无关紧要的也就舍去了。日记的前繁后简是由文革自身过程决定的。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为出版此书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我要感谢原社长陆国燊先生和现社长甘崎女士的大力支持；对于谢伟强先生、谢茂松先生，李学军女士、本书责任编辑袁群英女士难得的耐心和细致，为本书付出诸多辛劳，在此一并致谢。

张世英老师，以九十高龄欣然为这本《日记》写了一篇有特色的序，我尤为珍重。

2010年10月15日于上海长宁居

注释：

1 王若水（1926—2002），文革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2 胡乔木：（1912—1992），文革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3 周扬（1908—1989），文革后曾任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4 龚育之（1929—2007），文革后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作者简介：孙月才，1937年出生。1964年8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1966年5月25日文革爆发时，是北大哲学系二年级研究生。文革中曾任新北大公社1号勤务员。文革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研究员、教授。〕

（摘自孙月才著：《文革十年日记悲歌一曲》“自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三集），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

~~~~~

【动乱岁月】

抄家轶事

• 韩丽明 •

一

同学的父亲文革前是内蒙古医院的院长，那时内蒙古医院还在中山西路联营商店斜对面。他家住在那座洋楼里。

那座楼住着好几户人家，他家住一楼。文革初期，他家被抄过三次，两次地板被挖开。记得有一次地板被挖开是在晚上。那时家家用电都不舍得用大泡子，他家虽然点的是40瓦的灯泡，屋里仍是一片昏暗。

虽然是老房子，但质量还是很好。就拿地板来说，掀开后是炉渣，防潮用的。炉渣下面有长条青石，是地基。长石下面还是炉渣，需要掏开才能断明石条下面有没有他们想找的东西，比如地契、变天帐、金条，甚至机关枪。他们相信他父亲一定把这些东西深埋在里面了。挖的有点深了，而且绕到了石条下面，所以那个地方就更黑暗。为了让红卫兵看的清楚，他父亲便牵引过家里唯一的灯泡，为他们掌灯。他也蹲在边上出神地望着下面的深渊。真希望他们能挖出点什么。最好是机关枪。打开油纸，一挺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歪把子机关枪在灯光照射下泛着蓝光，那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啊，可惜没有！他说，他的失望不亚于这些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他们每次都空手而归，他都把害怕、恐惧悄悄变成难为情了。真的担心人们嘲笑我家“没有底蕴”。

他父亲一如往常地一脸安详平静，看不出是否失望，更看不出惶恐。他掌灯的手没有换过，就这么一直地拿着，几个小时，还不停地变换着角度，好尽量减少地下光照的死角，往黑洞里尽量多地送入光亮。这态度，比抄家的认真。

估计红卫兵们也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地板结构，当他们挖到青石条并越挖越开打算移掉它时，他父亲在旁轻声提醒说：“这得要把房子先搬开才行”。他们愣了几秒钟，后来又相互嘀咕了一会，终于无比失望地走了。

我的这位同学后来不断听说哪家哪家被抄出了什么“大东西”。那个结局，生不如死，太恐怖！这时他才知道什么叫“后怕”，才扎扎实实地庆幸家里没有抄出任何东西，包括他最憧憬的机关枪。

二

文革时，我们住的家属大院里有一个国家级的鼠疫专家，在日伪时期，当过日本的中校军医官，日子过的不错，解放的时候，家里头还有几十块没花完的袁大头。

文革伊始，这个老汉犹如惊弓之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他的老伴怕红卫兵前来抄家，袁大头会惹出麻烦，于是，就偷偷地在后墙外，找了一个地方把这几十块现洋装在一个坛子里埋了起来。

过一天，邻居老太太来串门，这位老妈热情招待。老太太坐定以后，便告诉这位老妈，说她家里遇到一件好事。老妈一听老太太说家有好事，立刻也高兴起来，催她快说。老太太乐得合不上嘴，乐完了才说，他儿子和几个小子，在后墙外起出一个坛子，里面装满了袁大头，有好几十块。当时，这几个小子就给分了。

这位老妈一听，差点没晕过去。缓了缓神，一想到自家的处境，不但啥也不敢说，还强颜欢笑，装作替人家高兴。

三

家属大院里还有一位刘老太太，无子女还格外信佛。信佛的人都相信人会有来生，死后可转世。刘老太太平常无事时一面念经一面叠锡纸元宝，每逢过鬼节时都要焚烧写上自己姓名的纸元宝并记载下数字，以统计有多少元宝预存在阴间了。红卫兵抄家时翻出了那个小本子，逼问元宝藏于何处。解释再三，红卫兵也不相信地主出身的一个无子女的老太婆会没有一个元宝。虽翻箱倒柜、掘地三尺也未找到，折腾到天黑，小将们的肚皮也有点饿了，遂决定先去吃饭，明天再来。

刘老太太在红卫兵进门时就已吓得丧魂落魄，听说红卫兵明天还要再来，更加惊恐万状。想到自己阴间的财产已经不少，到地府后的日子也不会太难过，不如早点了结性命去见阎王。第二天一早，红卫兵来时，她已吊死在凉房里。

四

1966年红八月，一天凌晨，地方病研究所所长家的房门被人雷得山响。门一开，只见一群红卫兵簇拥在门口，横眉立目、凶神恶煞一般。一个打头的宣布抄家决定，家人被勒

令沿门外一字站开；其余的人喧嚣着涌进家来，一边翻箱倒柜，一边大喊大叫。人们都在门口惊讶地围观。

这个所长家我们去过，他的儿子和我是同学。因为人口多，他枉自做了多年的所长，家里和大多数普通职工一样一贫如洗，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张极不起眼、黑黝黝、样式简单的紫檀方桌。可惜这群红卫兵根本不识货，以为没有抄到值钱的东西，心有不甘地大骂：什么破所长，穷鬼！屁也没有！然后就把一只小闹钟摔坏在地上；撕烂了女主人几件旧花布衣服，为了泄愤还把她家喂的两只老母鸡，揪住翅膀活活摔死，才扬长而去。

五

听老人们说，旧城笼罗社里的“资方人员”，都是些很小、很小的“老板”。公私合营前雇佣了几个小徒帮工，说穿了，不过是勉强能自食其力。

在旧城的众多小老板中，被抄家搞得最惨的当数杨某。杨老板后来患了精神上的毛病，经常病假呆在家里，偶然看见他来厂里时，已风度不再。有人记得那个晚上，杨某被“小将”们勒令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上来回上下地折腾。不知上上下下有多少回，一定要他交出金银财宝的藏匿处。最难忍的是杨某的患有高血压的胖夫人，被罚站在一张凳子上，还要把头低得挨住裤裆。一个“小将”手持皮带威胁地问她：“你是想死，还是想活？”这时，谁也料不到的事发生了：胖夫人竟然从凳子上爬下来，径直往打开着的二楼窗口奔去。要不是有人当时头脑还算清醒，飞快地追上去阻挡，一条不能再忍辱负重的无辜生命就从世上消失了。

那天从杨某家抄走的都是些日常家用的旧东西，满满装了一卡车，活象是一辆疯狂回收废品的脏车。甚至有人把一根闲置着的自来水管也扛在肩上走出杨家，在卡车就要开动时扔了上去。当抄家的队伍离开杨某家时，屋里已被洗劫一空，孤零零地只剩下一对不知所措的夫妇。

六

听说木器厂的朱某还算是有点财力的“资本家”，因为从朱家抄出两根金条。还听说有人趁抄家之便，在翻查朱家抽屉时来了个顺手牵羊，私拿了一只金镏子藏在口袋里。在那些可以肆无忌惮地侵扰私人一切财物和隐私的日子里，“资本家”已成了一个没有人格的群体。

据称也曾是木器厂股东的某女士，那天也被殃及。这女士有个谁都不能轻易进入的卧室，平时一直房门紧锁。那天抄家的队伍闯入她家时，正巧她不在，儿子急着叫人去唤她回来，若再迟，抄家的人们可是要破门而入了。

门打开后，“小将”们七手八脚地动起手来，顿时居室内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保养得很新的皮沙发被剪子铰烂，露出一团团棕丝和一圈圈弹簧来。有人还拿来了一根铁棒，砸开水泥地面，撬起了地皮下面一堆堆泥土。衣橱和化妆台里的东西被扔得满地，还有人舞起了女主人衣橱里的布料，披在身上玩。

那个女士的桌子前放着一本影集。许多照片都年代久远，颜色发黄。从照片的背景来看，都是一些很有情调的场面，女主人对过去那段年华一定有着深深怀念。

突然，从外面闯入几个气呼呼的女人，说是要揭露和批斗女主人，激烈的仇绪中透出要彻底搞臭一个女人的强烈愿望。他们把另一个有历史问题的男人也揪到一处来，因为传闻他俩有过暧昧关系。这男人在解放前好像参加过什么组织，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那天，有个“小将”拿着一张搜到的、已发黄了的照片，指着照片上“摄于民国三十六年”的字样责问她：“为什么不老实交代你在1936年就已参加了反动组织，竟然撒谎说是1947年？”那女人很平静地回答：“民国三十六年，不是1936年。”“小将”们这才意识到，民国三十六年大概与1936年不是一回事，只能把这条罪名先放一放再说了。

那天的抄家持续了好长时间，马路上站满了观望的人群。人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的症状：疯狂。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几乎都疯了。

七

1966年，大同城里也“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们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每到一个大户人家的院落便上房拆除屋脊上的兽头，砸八仙桌太师椅上的雕刻。收缴一切古旧的东西，包括妇女的绣花鞋，老太太的丝绒帽子。以至发展到剪辫子。在路口设卡，只要见谁头上留着辫子，不管愿意不愿意，强行剪掉。

在得胜堡大揪“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也兴起了“抄家”风。如狼似虎的红卫兵们，带领一群贫雇农出生的懒汉二流子就像日本鬼子进了村，直抄的鸡飞狗跳。他们什么都不放过，什么都要：猪羊鸡鸭、锅碗瓢盆、扁担水桶、锄头镰刀、板凳风箱、破盆烂罐、破衣烂衫，无一幸免。对于那些个懒汉二流子来说，反正蚰蚰也是肉、蚂蚱也是肉。

得胜堡600多户人家，被抄的就有十几户。被抄户十几口人老少几代被锁在一个屋内，将他们家的缸、箱、盆、罐摆了一街，犹如洗劫。

那天他们来到五舅家，院子里挤满了人，五舅五妗慌恐不安地站在院子里。抄家的人声色俱厉地威胁五舅，令他交出银元，交出变天帐。听说，那天，五舅家那道精心修建的影壁都被推倒了。还有几个人爬到大门楼上，掀开了顶；磨眼、磨底下的洞洞都掏了；院子里的肥堆也挖了，结果一无所获。然而，他们不愿意空手而归，把姥爷留下的一件黄呢大衣（那是五舅家唯一一件像样的衣服，是姥爷民国时在丰镇的牧师家当厨师，人家送给他的）、一条黑围脖、一本圣经、一尊钉着耶稣像的铜十字架、一本发黄的老字典、一把铜尺、几本旧小说、几张民国时期的纸币，都拿走了。不容分辨，也没有任何收据。最重要的是把挂在墙上的一对自行车圈也给拿走了。这车圈是表姐夫买的，据说是名牌，没有用过，路过五舅家时临时放一下。

那天，五舅家准备过年吃的一只阉了的公鸡和几只兔子，也让他们抄了去。后来据知情人说，那伙人当天晚上就把鸡杀了、兔子打死，连夜炖着吃了。

五舅说，得胜堡有一家地主，仅有的两床烂棉花套子他们也都抱走了；一口过去做豆腐的烂锅，烂锅盖也端走了；就连那家大小子学木匠用的几块木板，两个五歪六斜的小板凳也给顺走了。

还有一户地主，提前听到消息，六十块钱就把一头猪贱卖了，钱让亲戚替他保管着。等那些红卫兵赶来去开猪圈门，扑了个空。虽然他们大失所望。但是还不死心，过了一两天，

又来折腾了一次。抄家的首领进来后，先是蹲在院子里观察，一边抽着烟一边不断地向门楼子上看。然后就叫人爬上门楼子，把门楼顶给拆了。这次他们大获全胜，竟然发现了银元，据说是一百二十块！就这样，没有任何手续，他们就把一百二十块银元都拿走了！那个地主气的要死要活，因为那些现银元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何年何月何人藏在上面的。

那天，人们喊着老地主的外号，让他跪下，并把他的胳膊别在背后，摁着他的脑袋又打又骂。老地主禁不住折腾，口吐白沫，昏倒在地。红卫兵们给他掐人中，灌凉水，把他弄醒后再斗。老地主元气大伤，数日卧床不起。

五舅说，那时得胜堡出身不好的人，天天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虽然他们土改后就一贫如洗了，但仍有人盼着黑灯重新洗牌，再凭空打点东西。

□ 来源：微信号《听老绥远韩氏讲过去的事情》

~~~~~

【亲历者言】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五）

• 阎长贵 •

（上接 z k 2 0 0 5 b）

## 十二、一九六七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

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树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

林彪上任不久，就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头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穿军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军队支持。毛泽东穿军装，主要的意思应在于显示他的军队统帅身份。建国后毛泽东就没有穿过军装，由于他身材高大，他要穿军装，就要穿特制的，一时上哪里找？正好8341部队有个警卫干部身高体胖，把他的一套新军装拿来，虽然有些紧，总算凑合了。以后有好多人都写信，说为什么不给领袖准备一套合体的军装？！毛泽东穿军装反响非常，穿军装在文革中成为时尚。有军籍的人，没有军籍的人，从总理起，许多人都穿起了军装；当时不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不论做记者的，还是外出办事的，都穿军装，人人以穿军装为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

送给江青和你们军装究竟是林彪的主意，还是叶群的主意？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叶群打着林彪的旗号做的事情。叶群用意很明显，就是讨好江青，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

我1967年1月到江青身边，还有人领我到军需处的仓库根据我身体尺寸补发了一套军装。我没有当过兵，不懂军队礼节，穿上军装既觉得光荣又感到别扭，走过中南海、钓鱼台的门口，站岗的战士两腿一并举手敬礼，吓我一跳，不知道怎么应付。

文革后我曾问过汪东兴：“林彪是否也送军装给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汪断然说：“没，只送给你们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不仅送了陆军军装，后来还送了空军军装和海军军装。”

江青表现得很有军队“情结”，她不仅煞有介事地穿着军装出头露面，而且把她视为自己的样板戏团“北京京剧团”也纳入军队编制，演员都穿上了军装。这样一来，弄得很多剧团纷纷要求参军，也想穿上军装。江青在1967年11月9日和12日召集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说：“关于参军的问题，你们不要着急。”当时全国人民有多少人穿军装，我没有统计过，但它也像佩戴毛主席像章一样，成了文革中的一道重要风景线。

1967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横排本的《毛泽东选集》。书刚出来，叶群就急急忙忙拿来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并说：“这是林副主席送的！”林彪在送给江青的那一套上签了名，送给工作人员的没签名。当着江青的面，我代表工作人员真诚地向叶群表示：请叶群同志转达我们对林副主席的感谢，我们一定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认真学好林副主席送给我们的毛主席的书，努力做好为江青同志服务的工作。叶群说：林副主席送给你们毛主席的书也是这个意思，并亲热地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接到林彪送的书，的确很高兴，觉得很光荣。我恭恭敬敬地在这套《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道：这是林副主席惠赠的书，一定要好好学习。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我想，这次送书虽然也用了林彪的名义，恐怕也是叶群的主意。

1968年1月，我遭江青诬陷被投入秦城监狱时，管理人员一定要我把这扉页撕掉，我还很心疼。

林彪和叶群还到钓鱼台十一楼看望江青。1967年春天，林彪来了坐在会议室里，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来了不用上水，因为他一般不喝水。江青拿着毛泽东写的几幅字下楼来，转送林彪（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宣纸给江青写过好多字）。江青说：“这几幅送林副主席，还有几幅送老夫子（指陈伯达）。”林彪不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叶群说：“我们是一介武夫……”，表示很感谢江青。至于这次他们究竟还谈了些什么我就知道了。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跟秘书们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我觉得，在文革初期，叶群是这样做的，确实处处学江青、跟江青，对这一点我有亲历和感受。

江青在接见红卫兵以及其他群众时，几乎没有一次不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说：“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叶群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时也鹦鹉学舌地说：“我代表林副主席来看望大家！”林副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云云。在许多群众场合，叶群经常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文革中接见红卫兵的会议很多，还不断有“样板戏”的演出。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某某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去不去？我就反问她：“您去不去？”“叶群总是回答：“江青同志去我就去！”我都会如实地把情况告诉她。如果我不知道情况，我会问过江青后，再打电话告诉她。这可以看出叶群对江青的讨好。

我清晰地记得一件事，1967年国庆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首都机场迎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叶群早早去了，客人都要来了，叶群看江青没来非要走，周总理不让她走，她还是设法悄悄离开了。叶群回到毛家湾，洋洋得意地跟工作人

员说：“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青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显示，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地溜了！”这件事情很典型，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叶群对江青态度的心理。

当时毛主席像章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叶群搞到新品种，就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送来。1967年初夏，在北京还不到吃西瓜季节，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送来几个南方西瓜。那一次我对林立果印象很好。他二十多岁，小我七、八岁，坐在我办公室里，显得很老实。话不多，问他一句，说一句。后来，即“九一三事件”后，我在秦城监狱里，看到批林彪的文章，说林立果是什么“超天才”，干了这样或那样的坏事，我很感慨，觉得：“人真是不可貌相！”

还有一次江青让我到毛家湾给林彪送一个什么文件，在我坐在会议室里等候回音时，叶群拿出五六支圆珠笔交给我，嘱我给江青两支，其余的留给我和工作人员用。在当时，圆珠笔在中国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市面上尚难买到。上面几件事情看来都很小，却也反映了叶群的良苦用心。

关于江青和林彪与叶群，谈不上有什么真诚的情感，主要是在相互利用，做姿态，做表面文章。林彪应该是对江青不会有什么好感，主要在于不敢也不愿得罪毛泽东；至于叶群，在文革的初期，不排除她有结交修好江青的愿望。而江青未必看得上叶群，主要也是要实施毛泽东的战略，要拉住和利用林彪的势力。因此，在叶群方面，则做出很关心江青生活的样子。

比如，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想吃点什么东西？你们那里搞不到的话，我们这里有办法。”我对这样的电话很反感，私下不满意。我心想，江青想吃什么东西还搞不到？她有专门的生活管理员嘛。不过，对这种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过，我觉得这太俗了，江青知道了也不一定满意。这大概反映了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的清高心理。

说到江青的生活，她在一次散步时跟我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她让我告诉汪东兴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说实话，就吃饭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她在吃饭问题上，比较难侍候也是出名的。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需就餐时，一般她都要带着厨师程汝明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那里的厨师也要就江青的口味打电话询问程师傅，也正因为这样程师傅得了一个他当时还不解其意的雅号：“遥控”。

应该特别提一下，她对我们不仅很热情，而且很关心，还经常嘱咐我们“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我因为什么事情耽误，江青已经走了，我没车回钓鱼台。叶群知道了，热情地对我说：“没关系，用我的车送你回去。”我坐叶群的车回到钓鱼台。这使我对叶群的好感顿增。

不过，当时在我脑子里，江青还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江青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才看到她工于心计，有些事或有些情况下甚至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但当时我对此一点也不了解。同时，我对叶群伙同江青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也丝毫不知道——因为这些事都是她们在我当秘书以前干的。应该说，19



67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还处于蜜月时期，虽有分歧和矛盾，但还没有激化和公开暴露出来。所以，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我没听到江青说林彪、叶群的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叶群以及林彪接触，包括打电话，要注意什么。

关于李讷在《解放军报》造反，林彪、叶群的态度，我知道一点。李讷是1966年底调入《解放军报》的，用的名字是“肖力”。她在1967年1月和军报几个青年一起造反，打倒了《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到夏天，又打倒了党委书记赵易亚，她成了《解放军报》的负责人。有一天，李讷很高兴地跟我说，她去见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很鼓励她，支持她。她说：“我跟林副主席讲，我对办好《解放军报》没信心。林副主席十分认真地跟我说：‘你现在都27岁了，一个军报的担子还担不起来？你知道不，我25岁在中央苏区就是军团长了，到延安，27岁当了军政大学的校长，干事情要有信心，我相信你能搞好！’”李讷对林彪这次接见很满意。我听到她的介绍，也很高兴，我跟她说：“林副主席说得对，你要有信心，一定能搞好！”

### 十三、一九六七年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许多有关文革历史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时，都强调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甚至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

我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不错，江青在总理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总理。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当然，这是戚本禹一个人的说法，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汪东兴，他也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就1967年我所看到的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实实在在得不出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和要打倒总理的结论。至于1967年之后，我就不清楚了。后来的变化，应和毛泽东的态度有关。

总理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总理亲自先给我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总理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总理就会来。总理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总理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高兴兴痛痛快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藉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二月逆流”事件以后，江青对总理的态度也没有什么改变。

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到一份有关总理的什么材料，内容现在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贴总理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我当时自然理解为江青是维护和热爱总理的。江青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中央财经学院的一位年轻教员，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给我来信说：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等等，并附来了总理讲话的记录稿；其意思是想就总理的这次接见写总理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有一次看电影《怒潮》，反映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故事的。看完后，在从钓鱼台十七楼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跟我们说，总理和刘少奇不同，在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贯彻执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叫工人赤卫队缴枪，总理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他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搞得好。这是我听到的江青赞扬总理历史功绩的一次谈话。

文革是那样一个复杂而激烈到严酷的政治环境，设身处地替总理想想，也真是作难！总理要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很多大事要处理解决，而江青又是那样的身份、态度、脾气，他要常和江青交流意见。

我给江青当秘书时，还代理过半个月的警卫员。1967年4月份检查身体，发现警卫员孙立志有肝炎，按照规定，孙立志不能做警卫员了，中央警卫局就挑了一位姓杨的同志代替，只一天时间，江青跟我说：“姓杨的不行，我怕见生人，你代理一段警卫员吧。”我说：“不行，我一点警卫知识也没有。”江青有些生气地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嘛！”我没法推脱。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总理有时坐江青的车。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了。我认为，主要就是总理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经过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总理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江青，她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总理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这个情况。所以总理有时要坐江青的车一起去开会和参加活动。至于他们究竟讨论过什么问题，我当时没怎么注意去听，现在一个完整的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有一次总理跟江青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把握方向，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江青怎样回答的，我也不记得了。

关于江青对总理“耍态度”，我见过。1967年国庆日前后（1967年9月26日—10月14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对外文委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招待谢胡一行，以对外文委的名义发了请柬。这是中国招待国宾的惯例。江青拿到这个请柬后，在人民大会堂，冲着总理大发脾气。她怒气冲冲地说：“搞京剧改革的时候，他们反对，现在他们贪天之功，拿别人的成果，以他们的名义招待外宾。这像什么话！”类似的话，江青接连嚷了几次。总理则和气地连连对江青说：“不要生气，可以改嘛，可以改嘛！”总理说改，还不容易！通知一下有关部门就改了。新改的请柬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听到回馈：同一个招待会，谢胡一行收到了落

款不同的两份请柬，他们不知底里，还以为招待他们的规格提高了。谢胡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要把这两份请柬一同带回阿尔巴尼亚，放在历史博物馆里，让阿尔巴尼亚人民都知道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多么深厚！”

“总理，总理，什么事情都得理。”总理确实是中国最忙的人。周恩来自己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见周家鼎《周恩来忍辱负重的岁月》，《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日理万机”——作为总理来说，一点不假。江青不管这些，不顾这些。她常常缠着总理，她做的事，她的活动，总是要求总理参与。就是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也要总理和她一起看，演出结束后，她给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也要总理陪着。这样的情况，我是经常看到的。

总理对江青采取这种态度恐怕也包含着大政治家的“远虑”，想到毛主席……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在接总理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后，‘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该书第293、297页）从林青山的叙述，还告诉读者，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这样林自以为聪明地胡编，只会给历史制造出混乱，把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单到“小儿科”、“退婴症”。

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都是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页）总理对江青的态度是总理对毛泽东态度的折射和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总理。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总理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总理。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总理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总理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总理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主席对总理的态度为转移的。文革前期，毛主席需要周总理支持文革，江青也对总理采取亲近、依靠和保护的态度；“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对总理有所疑忌，江青也认为总理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因此在毛主席接二连三敲打批判总理的时候，江青都要比毛主席走得更远。但是，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就要整总理、打倒总理，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都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十四、江青是打倒陶铸的急先锋

陶铸在文革初期迅速蹿红，又迅速跌落，他只当了四个多月的常委，据说他的失势和江青有关，甚至有人说：“陶铸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泽东偏信了江青等对他的诬陷……。我认为，这样说不大符合历史事实。毫无疑问，江青是打倒陶铸的急先锋和前台司令，陶铸被打倒，她起过别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说陶铸就是被江青打倒的，显然言过其实。

在文革前，毛泽东、江青同陶铸、曾志关系是很好的，江青几乎每年都到广东过冬，毛泽东“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但她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毛泽东还曾经叫曾志替江青买一块表，曾志托人到香港买了块金壳劳力士坤表，给了江青。（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320—321页)陶铸文革前就已担任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性格率真、豪爽,爱放炮。1966年,毛泽东调他到中央,1966年5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让陶铸代替彭真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代替陆定一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时,毛泽东钦点陶铸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陶铸连升三级,从中央委员到政治局委员到政治局常委又到常委中的第四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恐怕也是很罕见的事情。然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动员陶铸首先起来批判刘邓,被婉拒。江青对此很不满意。认为陶铸“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加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还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而他不解毛泽东这样安排的深意。毛是希望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中央文革小组上,而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书记处上,而且让陶铸和江青处在直接互相交往的位置上。但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陶铸没有附和她,甚至两个人经常争吵。

我听说,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问题的争论。吴传启是当时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哲学所的一个负责人,是关锋的朋友,六十年代曾与关锋、林聿时以“撒仁兴”笔名发表过不少文章,名噪一时;文革中又是“学部”最早的造反派成员,也是学部造反派群众组织联队的“勤务员”。

关于江青、陶铸争吵的事,王力回忆说:“陶铸抓社会科学院(当时不叫社会科学院,而叫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化大革命,那时侧重整黑帮、特务,陶铸在文革小组会上说吴传启是国民党特务。(这也不对,据说吴传启是共产党派去参加国民党的)陶铸坚持要整吴传启,江青马上反对,说吴传启是革命左派,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江青说吴传启是左派,陶铸说吴传启是国民党。江青说,你说吴传启是国民党,你陶铸也是国民党!陶铸发火了,说我是什么国民党,我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派我去参加国民党的,吴传启是真国民党。陶铸还大声说,按你这样说,毛主席也是国民党!江青从来没受过这样对待,马上就哭了。……陶铸为吴传启问题同江青争吵,使江青不能容忍陶铸。”(参见《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页)经过这次吵架,江青和陶铸彻底闹翻了。

按常识判断,陶铸也未必怕你江青什么:一是自认为长期紧跟毛,毛对他信任有加;二是林彪曾是他的老上司;三是周恩来对他很好,依靠他;四是负责常务工作,不能使局面失控,包括对刘邓,认为拿下来了,不必搞得太挖苦,认为自己在顾大局;五是江青盛气凌人、唯我独革、搞极端主义,他不能接受,认为问题在江……

但事态的发展,是出乎陶铸所料。江青竭力支持吴传启,也可能是受关锋的影响;但也可能是拿他做“法”。我们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江青和陶铸吵架的情况,但我也感到一些文革小组成员对陶铸态度的变化。我在江青办信组工作时,戚本禹向我布置说,凡是中南地区以及和陶铸所管部门与系统有关的信通通转陶铸。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多让陶铸去表态,看能不能抓到什么把柄。我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看到,11月27日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出了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参见该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又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69页)

1966年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这个大会陈伯达主持,江青发表讲话——这是这次大会最主要的讲话。江青在叙述了京剧革命现代戏取得种种成绩后,接着讲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

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见《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25页）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人和切实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了解这段话所包含的深层含义。为什么在所列中央领导人中缺了陶铸？按规矩，陶铸是中共四号人物，又分工管文化教育，不能不列入。这当然不是疏忽，而是江青和陶铸闹翻了，不承认陶铸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江青这篇讲话，毛泽东改过好几遍的，改得非常认真，为什么没把陶铸的名字加上呢？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认为这就是打倒陶铸的鲜明信号！因为江最了解毛，知道毛在想什么，所以她才胆敢对陶铸发难。没有毛暗里的态度，哪有江青的态度？

1967年1月4日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接见武汉造反派的会是江青策划和组织的。在这次接见会上，主要是陈伯达讲话，江青插话。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联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未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江青插话）。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指1966年12月30日的接见）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编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446—447页）从此，文革中“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陶铸没有站在文革前沿，积极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应是事实。但是不是站到了刘邓一边，似也缺少证据。但是，毛泽东也说过：“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而在十一中全会以后仍没有和刘邓划出明显界限，在立场和观点上也就自然和江青与毛泽东不同了。这样，毛泽东不能容忍了。于是，江青也就担当了毛泽东抛弃和打倒陶铸的急先锋。

中央文革还在中南海组织中南海里的造反派面对面批斗刘、邓、陶。当天我到了批斗现场。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配发《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说：“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同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举行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出一周年，声讨刘、邓、陶。与大会召开的同时，中南海内要刘、邓、陶出来收听大会实况广播，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的。江青、陈伯达，主要通过戚本禹，组织中南海“革命群众”对刘、邓、陶夫妇在各自的院子里进行批斗。这一天，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夫妇，你们去看看嘛！”我和几个人去了，李讷也去了，我和李讷一起连续到三个会场，看到了批斗刘、邓、陶夫妇的实况，什么责问、声讨、按头、扭胳膊，等等，还有呼口号，等等。江青为什么要我们到批斗会现场去看？我认为，这反映了她的阴暗心理。新闻电影制片厂对这天的批斗会还摄制了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当晚在钓鱼台十七楼放了一次，而在这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戚本禹紧急指示办事组告诉新闻电影制片厂将这个纪录片销毁。我想这么大的事，戚本禹不会是自作主张，应该是“奉命”。至于其中的“道理”，我不清楚，也没打听。

## 十五、江青和康生、陈伯达的关系

关于江青和康生、陈伯达的关系，先说江青和康生的关系。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溶等，山东胶南县人，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75年12月16日逝世。

1、康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刘少奇。在1966年5月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竟然不知道这个《通知》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是刘少奇。他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还向刘少奇做检讨。他说：“王明路线的时候，我犯过错误，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过反对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为谢康。这个谁也不能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据穆欣《梦醒时分——十年动乱纪事》，未刊稿；此书是穆欣对他1997年在香港新天出版社出版的《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的修改稿，2009年红旗出版社想出，嘱笔者看过，但未获有关部门通过）还说，在延安我向你做过检讨，在今天我还要向你检讨，将来还要检讨。

2、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历史表明，康生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六十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康生的秘书出去接他们。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按：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在“文革”的书中，讲到邓1973年从江西回京后，去看这个人、那个人，篇幅很大，而去看康生的事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历史的态度。——笔者）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项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李鑫（他原是康生的大秘书）；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按：康生做了大量坏事，当然与他的品质有关，是不是也要从体制方面找找原因？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笔者）

笔者补充一点，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林彪和江青搞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甚至把邓说成是敌我矛盾，这样一来，邓觉得没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所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交给“康老”——这恐怕也是证明邓和康关系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3、康生和周恩来过从密切。康病后，周恩来多次来看他，说他们同年生（1898年），还说他们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个人（指周、康、陈云）了，康比周早死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这个消息没告诉周（因他在频死的病中），周在病危时跟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儿去吧！”现在书上都避讳康而说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里去吧！”

4、而康生和江青的关系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据康生秘书黄宗汉说，江青在延安和毛主席结婚后，康生曾告诉江青，你跟主席结婚，成为主席夫人，和你在上海当明星不一样。江青在1972年会见美国历史学家维克多的事，康很不满。十大前，江求康替她说进常委的事，康不同意，跟总理讲，总理回答，主席说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足矣。

还有一件事，是关锋告诉我的。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因为打倒陶铸的方式和程序的事，批评了陈伯达、江青（说陈伯达：你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说江青：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二人搞的），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他们。这个会当然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主持。届时，他和王力去请康，康说：“要批评就批评江青，连陈伯达都要自杀了，都是江青搞的！”

5、康生是紧跟毛泽东的。在政治上，毛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在对待子女上，他也像毛一样要求很严格。他有一个前妻的女儿当工人，生活很困难。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济南调浙江，他不同意。他收集很多文物，如砚台、字画等，临死前，问他怎么办，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他说：不，通通交公。存款8000元也不给子女。

6、就康生和陈伯达相比，江青对康生还是比较尊重的，我见过江青像“三娘教子”那样训斥陈伯达，没见过江青这样训斥康生。从总理起到普通工作人员，对江青，都称“江青同志”，而康生则经常直呼“江青”其名。这可能是从延安继承下来的习惯。但这并不完全表明，康生不尊重江青（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怕江青）。康生后来在公开场合，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种称呼的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下面再谈江青和陈伯达的关系。

陈伯达（1904—1989）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理论家。政治上从1939年起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秘书达31年，建国后其职务最终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现在的说法达到了“正国级”（关于他所犯的错误以及他受到的惩罚我们姑且不论）。

众所周知，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第一副组长），但执牛耳者即真正掌权的是江青，陈伯达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公开说，他不过是“刘盆子”。江青经常训斥陈伯达，就像骂小孩一样。陈伯达有个口头禅：不论在谁（包括一般工作人员）面前，总是把拳一抱，说：“我是小小老百姓。”我亲自听过江青斥责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说什么小小老百姓，这不是谦虚，而是推脱责任！”

我觉得，江青对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这个尖刻、辛辣的数落，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的一个致命软肋，即：好推脱责任。

关于陈伯达“好推脱责任”的致命软肋，我举一个在党史上很有影响的例子。

1967年1月由关锋（时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主管军报）等人制定的《军报宣传方针》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过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特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时候，关于这个口号的宣传达到顶峰。我不说《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关于这个问题的宣传，只说《红旗》杂志。该杂志在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其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揪“军内一小撮”的这种宣传造成了严重后果，军队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地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许多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天下大乱了——犹似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靠军队的。“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底线。当他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以此为据，他“挥泪斩马谡”（我所以借用这个古代故事，是因为毛泽东要拿下的关锋和王力在为他发动文革制造舆论方面，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把关锋（《红旗》杂志的常务副总编）和王力（也是《红旗》杂志副总编）“隔离审查”了（实际上是做替罪羊），——其后还关了监狱，并长达14年。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就说他没看过，这显然不符合事实。陈伯达在说假话。

陈伯达说他没看过《红旗》12期八一社论为“假话”，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明。这就是《红旗》12期除了这篇纪念八一的社论，还有一篇专门就“七二〇事件”写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切阶级敌人，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只不过是银样镗枪头一根，纸老虎、泥足人一个，虚弱得很。”这段话中的“银样镗枪头”就是陈伯达改定的。原来是银样“蜡”枪头，——什么是“银样‘蜡’枪头”，即枪头上涂上“蜡”，这话不通，《西厢记》和《红楼梦》中都说的是：“银样镗枪头”而不是“银样‘蜡’枪头”。“镗”，是锡铅合金，可焊接金属，亦可制造器物。“银样镗枪头”，其释义是：中看不中用。陈伯达把“蜡”改作“镗”，这表明了陈伯达知识比较渊博，做事也比较认真。陈伯达既然对这篇社论都这样认真审阅和修改，反而对更重要的八一社论他能不看吗？！很显然，绝对不会是这样。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关于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文革后我也问过关锋，他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从《红旗》杂志总编室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